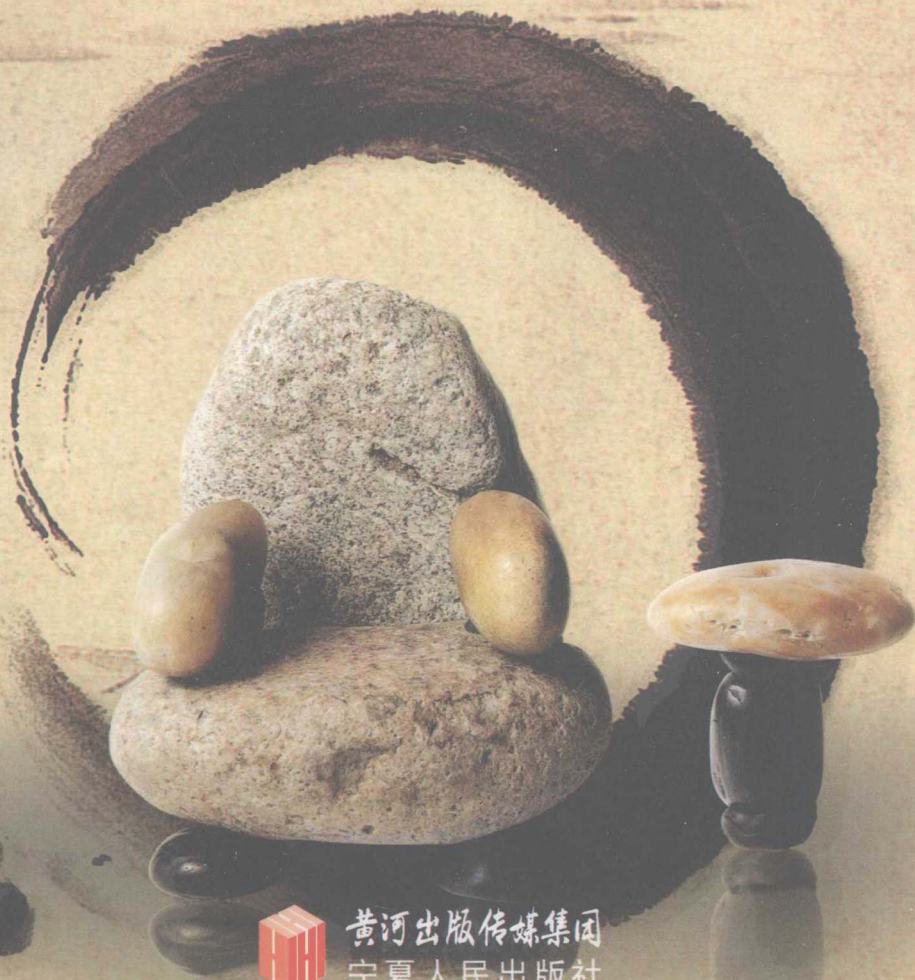


历代 爱国文学家评传

主编 龚世俊 蔡永贵 李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历代 爱国文学家评传

主编 龚世俊 蔡永贵 李宁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代爱国文学家评传/龚世俊, 蔡永贵, 李宁主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410-1

I. 历... II. ①龚... ②蔡... ③李... III. 作家—评传—中国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495 号

历代爱国文学家评传

龚世俊 蔡永贵 李 宁 主编

责任编辑 布鲁南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410-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深厚的感情 无穷的力量

——谈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代序）

陈育宁

爱国主义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一种崇高的深厚的思想感情，是对祖国、对民族命运的一种高度责任感。列宁曾说过：“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一定义说明，爱国主义思想的萌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对祖国诚挚浓厚的情感，是人们道德、行为、意志、信念的基础，是一种绵绵厚实、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动员和鼓励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是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爱国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氏族时代，即国家产生之前。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群体。这个时代人类有一种热爱各自氏族的朦胧心理，其最初的情感基础是血亲关系。对氏族组织的依赖，对先辈、祖宗先贤的追念，对故土山川的留恋，交织成一种深厚的情感结构，这是早期的爱国主义思想萌芽。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思想体系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逐步形成的。“爱国”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历史典籍《战国策》中，这显然是国家形成后的概念。东汉时，荀悦的《汉纪》中也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说法。当然，封建社会的爱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决定了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爱国是和忠君忠于皇帝联系在一起的；汉族作为封建王

朝的统治民族，它的爱国一般是与大汉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爱国一般又是和地方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不管怎样，国荣我荣、国辱我辱这个感情是相同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作为一种强烈的爱国信念、意识，塑造了许多民族英雄，他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并使这种爱国深情日益巩固，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

(1) 对自己的祖国有浓厚的眷恋之情。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古往今来，无数热爱祖国的志士仁人，继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故土、对祖国山河和人民大众深厚情感这笔永恒而无价的精神财富，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和流传千古的豪言壮语。

战国时期的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楚国沦亡和人民遭受苦难之际，写下不少诗句，发出了“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沉痛呼唤。三国时，曹操的三子曹植，是魏国的文学家，他写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北宋爱国诗人、政治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正是出于对祖国河山的无比热爱和对天下兴亡的关注而抒发并付诸实践的至理名言。在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不能团聚时，即使个人遭受不幸，爱国者们心中时时眷恋怀念的还是祖国。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一生写下 9000 多首诗，多数是以收复中原、统一祖国、反对投降为主要内容的。南宋当时与金国对抗，年事已高的陆游，自知无法上阵杀敌，还悲壮慨叹：“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充分反映了视死如归、忠于祖国的高尚情操。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何启赞颂祖国的锦绣河山说：“山岳为天下之至秀，江海为天下之至通，壤衍为天下之至腴，物产为天下之至富。”他又说：“夫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其宗祖千百年食德饮和于中国者，虽身居异地，亦莫不欲高抬宗国，盛称故乡。”意思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要对祖国多加赞誉。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说：“增四千年历史光荣，震九万里环球视听。”就是说，要发奋图强，为祖国悠久文明谱写新篇章，定会在全世界争得荣誉。这种浓厚的感情，当祖国和人民遇到危难时，就会转化为对天下兴亡的强烈责任感，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还有一句话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清代的学者顾炎武的名言，此话成为祖国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具有强烈号召力的千古绝唱。鲁迅先生也曾讲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

（2）勇于创造，报效祖国。

中华民族是世所公认的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中国的“四大发明”，无数的科学、文化、艺术成果汇成了以华夏各民族多元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并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将东方文明的种子播向世界。

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会产生出一部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对祖国怀有深挚的爱，并为此而不断地一代代地耕耘、思考、探索和实践。惟有对祖国母亲怀有浓厚感情的儿女，才会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科学、文化、艺术上作出代表祖国最高水平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这种永不衰竭的创造力，就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安宁幸福是爱国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从古至今，爱国的中国人都以各种方式为“富国强民”而奋斗，立志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自己的国家。

2200年前的李冰父子，出于对川西人民深受水旱灾害的关切，创造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令世人惊奇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东汉科学家张衡为向当时盛行的封建迷信思想挑战，使人民免受地震的威胁，发明了“地动仪”；北宋大科学家沈括，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总结了当时天文、数学、矿业、生物、医药等多方面成就，至今仍为世界科技史权威奉为杰作，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石油”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仅就印书言，雕版印刷始于隋末唐初。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9年）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到了13世纪，元代的王桢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西方活字印刷是德国的谷腾堡在中国活字印刷技术的影响下于1450年发明的，比中国整整晚了4个世纪。近年在宁夏的一项新发现又将木活字印刷提前了一个朝代。1990年贺兰山里的西夏砖塔被不法分子炸毁，1991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现场时发现一批西夏文、汉文佛经。经宁夏专家们考证并经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这批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时间为12世纪下半叶，这样，我国的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从公元13世纪提前

到 12 世纪，从元代提前到宋代。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怀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深热爱，进行了世人不曾涉足的艰苦的地理、地质科学探索。前后历时 28 年，足迹遍及 17 个省，在地理上取得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石灰岩地貌的记述，早于欧洲近 300 年。经实地考察，他证实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当今，我国许多旅游胜地，都是由他最先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的。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努力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赶上和超过欧洲。他尽力学习吸收西方科学成就，把天文、历算、火器等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传播，是我国近代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先驱。他写了一本农技书叫《农政全书》，译有《几何原本》等。

近现代无数在民族灾难深重中为祖国富强独立而耕耘探索的科学文化名人，不少是在窘迫和清贫中孜孜于科学文化创造的。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自觉地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拼搏。一些人提出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主张虽无法实现，但他们的实践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抛弃了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也怀着爱国情怀，孜孜以求，开拓创造。他们深知自己的祖国最值得为之工作，他们坚信中国人在国内一样可以做出外国人能做出的成就。他们和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一道，艰苦奋斗，努力钻研，搞出了原子弹、氢弹，搞出了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搞出了人工牛胰岛素、高产杂交水稻等等。地质学家李四光不怕难、不信邪，顶住“中国贫油”的所谓权威理论，勘探出中国自己的石油，壮了国魂、长了民气。很难想像，没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对自己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如何能在各种艰难困苦中坚韧不拔地进行科学文化的不断创造，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把中华文明推向了世界文明更为广阔的舞台。所以，爱国主义激励了每一个有志之士去发明、去创造，从而为人类积累了一笔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3）维护祖国统一。

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历史形成的独特国情和发展道路，造就了亚洲大陆这个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既不同于林林总总汇集在同中国面积相当的欧洲大陆上的各国，也不同于北美大陆以联邦形式组成的合众国，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经济区域和多民族组成却在政治上统一的东方大国，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公元前 221 年秦统

一中国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以来，统一的趋势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两千多年时间内，统一的时期占了三分之二，即使在三分之一的分裂割据时期，反分裂、求统一仍然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主旋律。这种统一的大势，保持了中国的存在、独立和发展，维系着中华民族顺应时代的不断更新。能够巩固和维护中国这个东方最大最古老的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和独立，自然有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因素。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成了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就提出天下“定于一”的著名论断，这一思想推动了统一的政治实践。秦汉帝国的相继建立从此奠定了中国统一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祖国统一和爱国主义是融为一体的，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陆游的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爱国主义思想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反映。清末维新诗人黄遵宪在他的诗中写道，“寸寸河山寸寸金”，又说，“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表达了对祖国每一寸土地的珍惜，也表达了中华民族永远是自己国土的主人，决不允许被他人主宰的决心。历史上搞分裂、投降、卖国的永远是中华民族中的极少数，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被历史 and 人民所唾弃。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统一局面形成后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结果，唐代、元代、清代中前期都是发展最快的时期。而分裂和内乱只会使各族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正因为有这种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历史上曾有过民族斗争和不同政权的对峙，但民族间的互相联系与依存、国家的统一始终是顺天应人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4) 抗敌御侮，反对外来侵略。

19世纪中叶，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蹂躏，封建主义的腐朽和黑暗统治，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但同时，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也空前高涨，“救亡”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中心主题，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历史上，国家民族的屈辱每增加一分，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扩大一步。一些重大的爱国运动，往往都是在我们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急关

头酝酿爆发的。在祖国面临被列强瓜分和灭亡的危机面前，近代的一些爱国主义者，无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堪称历史壮举。在清政府经不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他悲愤地说：“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把在帝国主义瓜分危机中的中国比作病入膏肓的垂死老人，梁启超则比作是即将倾倒的千岁老屋。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曾把当时的国家比作一栋即将倾倒的大厦，忧心如焚地发出“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呼喊。他们这种忧患意识，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觉醒，激发人们的斗争勇气，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陈天华说：“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道理。”孙中山说：中国凭借“四百兆苍生之众，数百万土地之饶”，只要奋臂而起，“振兴中华”，即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正是在这种救国救民爱国主义思潮的鼓舞感召下，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林则徐的焚毁鸦片、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反帝斗争等等，一直连续不断。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形成了无比坚韧的力量，击碎了侵略者妄图鲸吞中国的美梦。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

1894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中国给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官兵在黄海上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邓世昌等致远舰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北洋水师首领丁汝昌含恨自尽。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1840年到建国前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与外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协议共1100多项，第一个就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其中一条是“永久割让香港”。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有一条是永久割让九龙半岛。1898年6月9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及周围200多个小岛租借给英国，期限99年。这一百年国耻，今天终于洗雪，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香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们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1997年7月1日不仅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是伸张了历史的正义，也是中华民族尊严的回归，体现了12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爱国主义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对自己祖国热爱和眷恋的深厚感情，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进行的不懈创造，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等几方面构成了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也是我们要永远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传统。

著者按：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陈育宁教授所撰《爱国主义略论》一文，原载《学习与交流》1997年第4期。这篇论文在我们编写《历代爱国诗文评注》和《历代爱国文学家评传》的过程中，对我们准确把握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问题，以及选择历代爱国作家和作品、评价作家和作品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同时，我们相信，这篇论文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正确认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体会这两本书的编写体例、阅读两书的内容，会带来诸多的启迪。因此，经我们与陈教授商量，决定把该论文的第一部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刊于两书之首，作为代序。并由陈教授为序文重拟了标题。这样，序与正文结合起来阅读、品味，读者自可体会到：爱国主义的确是一种崇高而深厚的感情，是蕴藏着无穷精神力量的源泉。

2001年12月26日

目 录

深厚的感情 无穷的力量

——谈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代序) (1)

屈 原	(1)
司马迁	(10)
曹 操	(18)
庾 信	(27)
李 白	(37)
高 适	(45)
杜 甫	(51)
韩 愈	(59)
杜 牧	(66)
范仲淹	(72)
苏 轼	(78)
李清照	(86)
陆 游	(93)
范成大	(99)
辛弃疾	(107)
汪元量	(116)
元好问	(124)
夏完淳	(131)
顾炎武	(141)
龚自珍	(148)

历代爱国文学家评传

魏 源	(157)
黄遵宪	(169)
谭嗣同	(177)
丘逢甲	(186)
陈天华	(198)
秋 瑾	(207)
柳亚子	(217)
后 记	(227)

屈 原

(公元前 339? ——前 277?)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屈原的一生，爱国爱民，锐意改革，执着追求，最终以身殉志，用生命之弦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他用全部的心血凝成的以《离骚》为其代表作的千古诗篇，是继《诗经》之后首创的“楚辞”新诗体，同时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唯其如此，屈原已成为历代爱国志士、骚人墨客所同情所景仰的“与日月争光”的光辉楷模，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文学创作继往开来，“逸响伟辞”传颂至今，甚而远涉重洋，超越了时空界限，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魅力，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瑰宝。

一、惊才风逸 壮志烟高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后期楚国人。他在《离骚》开篇即自叙身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首句中的“高阳”是楚人传说中的始祖，即远古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接着谈到名叫伯庸的父亲，依据他吉祥的生日（见下文）取名“正则”，表字“灵均”。正则，公正而有法则，是“平”的释义；灵均，引申为高平，是“原”的含义。《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与此诗中的文学化名是相符的。同时，名“正则”、字“灵均”与名“平”字“原”，也合乎古人名、字相应的习俗。三四两句所说的生辰，由于楚辞学者对古历推算方法不同，至今众说纷纭。近人浦江清据“摄提”（即“摄提格”，指寅年）、“孟陬”（即正月，夏历称为寅

月)和“庚寅”(即庚寅日,与寅年寅月合称“三寅”,楚人视为吉日)推算出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他的推算比较周详精密。综观诸家说法,与其上下相差不超过四年。

《屈原列传》还说屈原是“楚之同姓”。据《史记·楚世家》载,周封熊绎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传熊通。熊通之子即武王。武王之子瑕,食采邑于屈,子孙遂以屈为氏。由此可见,屈原是楚王室宗亲。至于屈瑕食邑,历来无考。那么屈原故里究竟在何处?汉代以来,以秭归之说为最多。酈道元《水经注·江水》引袁崧《宜都山川记》说:“秭归,盖楚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俱存。”又说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

屈原的时代,处在我国历史上战国后期,下距嬴秦兼并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才一个世纪到半个世纪之间,所以说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大一统”的前夜。那个时代既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都处在大变革之中的历史转折关头,又是新旧力量对抗斗争愈加尖锐、社会动荡愈加剧烈的过渡时期。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分界线。当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束缚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主贵族也成为社会上腐朽反动的势力,这些都严重阻碍着历史的前进。同时,诸侯争霸,逐鹿中原。激烈的兼并战争,虽有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也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而人民奋起反抗奴隶主的反动统治,渴望结束战乱和实现天下统一的安定局面。显然,埋葬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新秩序,进而统一全国,乃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前进的大趋势。于是,在奴隶制的母胎里,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孕育成熟,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利用劳动人民的反抗力量,同奴隶主阶级展开反复的较量,最终取而代之,在各诸侯国先后建立起封建政权,地主阶级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这大变革的时代,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的结果,导致了战国初期七雄并峙的局面,诸侯列国只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等七个强国。此时,作为大奴隶主代表的周王室已失去“天下共主”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已沦为附庸而苟延残喘。七国的统治者都想壮大本国的力量以统一中国。他们各自都曾实行过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社会改革,破除旧的奴隶制度,建立和发展新的封建制度。后来,由于诸种因素的消长变化,特别是变法力度强

弱的影响，七雄中秦、楚、齐三国较之其它国家相对强大起来。

西方的秦国，地处“河山四塞”，进可攻，退可守。秦孝公曾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和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和农耕，改革成效显著，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经济和政治基础。东方的齐国货殖最富，濒临海滨，擅渔盐之利。邹忌为相，集权中央，厉行法治，赏罚严明，大力发展生产，开设“稷下之学”，延揽四方学者名流，并任用孙臧，整军经武，使国力强盛。雄踞南方的楚国，疆域辽阔，土地膏腴，物产丰富。就在屈原生前40余年，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结果，使楚国实力迅速增强。但新法推行一年多，悼王死去，仇恨变法的宗室大臣和贵戚们就群起作乱杀害了吴起，楚国的社会改革未能推行到底。到了屈原的时代，楚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政权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所操纵，朝政纷乱，国力渐衰。

屈原乃贵族出身，青少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学识渊博，通晓古今治乱兴衰，并擅长外交辞令。在其早年的诗作《橘颂》中，他托物咏志，说自己有堪为大任的才华。后来，屈原果真在二十几岁时，曾一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被任左徒之显位，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辅佐怀王治理国家，在内政和外交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进步主张却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正当屈原辅佐楚王，要革新楚国政治，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旧贵族的代表人物令尹子椒、上官大夫等，勾结一批王室宗亲，朋比为奸，向楚王进谗言陷害屈原。一向刚愎自用的楚怀王，一怒之下，罢免了屈原的左徒之职，降为三闾大夫，从此疏远了他。

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来，怀王又将他贬到远离郢都的汉北。他在汉北，作《抽思》篇，表达了对郢都的强烈思念。

屈原的政治变革失败后，楚国的新生力量和抗秦派也在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后来，楚怀王数次受张仪蒙骗，与齐断交，损兵失地之后，又想起了屈原。十八年（前311），派遣屈原出使齐国，以修旧好。

二十四年（前305），秦昭王即位不久，与楚结为婚姻，楚国又背齐向秦。后来，齐、韩、魏三国联军攻楚，楚以太子为质向秦国求来救兵，三国才退去。

三十年（前 299），秦昭王以与楚结盟的名义，把楚怀王骗至秦国囚禁，三年后病死。《史记》评道：“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在楚怀王被留秦的第一年，楚太子熊横继位，是为顷襄王。他比他老子更加昏聩，竟然听信谗言，又一次将屈原流放到江南荒远之地。屈原在江南孤独漂泊了九年，但他的心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虽九死而不悔”，表现出坚持真理、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秦国统治者并不因楚国投降派的卑躬屈膝而罢手，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起征楚战争。二月，秦将白起率大军攻占郢都，纵兵烧毁了楚国的王陵。顷襄王仓皇逃窜到陈城（今河南淮阳）。面对楚国的艰危和理想的彻底破灭，屈原不忍心看到祖国的覆亡和楚国遗民的灾难，更不愿身受亡国之辱，他在《怀沙》和绝笔诗《惜往日》中都表达了自己的殉国之志。大约在公元前 277 年夏历五月初五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自沉于汨罗江，结束了他悲壮的一生。

二、爱国忧民 向往“美政”

屈原虽是一位在社会实践中失败的政治家，但他却是在艺术创作上真正成功的文学家。他的政治生涯和创作活动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相反相成而统一地表现了爱国志士的伟岸人格和高洁志行；他的政治生涯和创作活动相互交织，鲜明而深刻地反映了进步思想家的政治理想和人民性。他将“美政”理想、爱国情愫和“虽九死犹未悔”的坚忍精神，都付诸切切实实的行动中；同时，这些思想与行为的精神实质，又都渗透于他的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成为其作品的灵魂。因此，我们不仅要从作为政治家的屈原的角度去体认其思想，还要从作为诗人的屈原的角度来观照其创作，进而将二者结合起来。

屈原的一生是为振兴楚国而求索、誓与祖国共存亡的一生。他居官在朝时，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辅助楚王，效法古圣先贤，发愤图强以建树统一天下之大业。他在《离骚》中写道：“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意思是说，希望楚王能像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广揽群英，任贤使能；像尧舜那

样光明正大，遵循正道，而摒弃夏桀、殷纣王那种邪恶不正的行为。为此，屈原表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他要做楚王的向导，奔走前后，以帮助楚王追及前王的足迹，继承先王的功业。

然而，屈原生不逢时，他所遇到的是一个黑暗险恶的社会：楚国的旧贵族反动势力败坏朝纲，蒙蔽和左右楚王；楚怀王父子两代都是鼠目寸光的昏君。这不仅是屈原个人悲剧的根源，也是导致楚国危亡的根本原因。屈原目睹楚国腐朽的统治集团荒淫无耻，朋比为奸，他们苟且偷安，出卖民族利益，把祖国引入幽暗险隘的绝路。屈原身受诬蔑、排挤和打击，陷入黑暗的包围之中。这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安危：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

这里的“皇舆”，本指国君所乘之车，借喻君王统治的国家。

屈原遭谗见疏被放逐后，在穷困潦倒之中仍不改其初衷，“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史记·屈原列传》）“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离骚》）“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惜诵》）“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哀郢》）长期流落蛮荒僻远之地，见君无日，报国无路。面对楚国的黑暗衰败的现状，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诗人面前。

当时，大多数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观念非常淡薄，往往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尤其是“游说之士”，朝秦暮楚更是司空见惯，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象屈原这样的旷世奇才，并非不能远适异国以求个人事业的成功。他在困厄逆境中，也曾想到去国离乡的出路。但在尖锐复杂的心理冲突后，终于不忍离开故乡。留国的意向便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以终穷。”（《涉江》）这种心理冲突表现为两种人格的斗争：一是荆楚民族赋予他的眷恋乡国的秉性；一是北方政治家周游列国风气对屈原的影响。结果前者战胜了后者，这正是屈原的难能可贵之处。

当然，我们肯定屈原的这种人格选择，并不意味着否定北方政治家们顺应历史潮流的战国时尚。相比之下，我们看到乡土情愫的局限性。无疑，这些都是爱国思想中民族狭隘观念中的消极因素。但我们也应看到，爱国本身